

引子

小聚秋聲裏。近黃昏，籬花搖暝，庭柯雕翠。殘葉辭枝良未忍，耿耿護林心事。正嗚咽，風蕭易水。三十六年真電掣。剩畫圖，相對渾如寐。誰與攬。澄清轡。

故人各了平生志。早一抔黃花嶽麓，心魂相倚。為問當時存者幾？落落一人而已。又華髮星星如此。剩水殘山嗟滿目。便相逢，勿下新亭淚。為投筆，歌斷指。

——汪精衛·金縷曲

一九四一年六月，南京偽國民政府首腦汪精衛，赴東京，與日相近衛文麿等人交涉——共建所謂「東亞新秩序」。其間，汪會晤了支持孫中山革命之日本浪人宮崎寅藏的遺孀。宮崎夫人拿出汪精衛、黃興、章太炎等七人三十六年前在東京的合影。汪手持舊照，萬感交集，寫下了這首《金縷曲》。

時在清朝末年，汪精衛正是一翩翩少年，在東京擔任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主筆，熱心革命，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一九〇六年秋，革命黨人在江西萍鄉、湖南瀏陽、醴陵等地，發動反清起義，犧牲慘劇。汪，黃等人聞訊，哀慟之至，決心回國親身參與行動，圖謀再

舉。臨行前一日，在《民報》社的庭院內，留下了這張合影。^一

時間匆匆走過三十六年。在中國現代史上，這是亂石穿空、驚濤裂岸的三十六年。汪精衛正像其所自喻的「精衛」一樣，一頭扎進中國現代政治的大風大浪之中，與此波詭雲譎的歷史相始終，以其政治生命的成敗，探知着歷史的深度。^二

一 汪精衛：《金縷曲》題解，《雙照樓詩詞稿·掃葉集》，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二〇一二年版，第三一七頁。

二 由於汪精衛在民國政治史中的重要地位，有關汪的研究數量眾多。傳記作品的出版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紀三十、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如：革命舊人：《汪精衛的全貌》，出版地不詳，且華出版社，一九三九年；雷鳴：《汪精衛先生傳》，《民國叢書》第一編第八十八卷，上海書店根據政治月刊社一九四四年版影印；聞少華：《汪精衛傳》，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王美真編著：《汪精衛傳》，臺灣：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八八年；蔡德金：《汪精衛評傳》，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李理、夏潮：《汪精衛評傳》，武漢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王關興：《汪精衛傳》，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等等。關於其思想、執政方針、對日政策等問題，亦不乏專著及論文。例如：陳木杉：《從函電史料觀抗戰時期的蔣汪關係》，《從函電史料觀抗戰時期汪精衛集團治粵梗概》，《從函電史料觀汪精衛檔案中的史事與人物新探》等，臺灣學生書局出版，一九九五—一九九七年；謝曉鵬：《理論、權力與政策——汪精衛的政治思想研究（一九二五—一九三八）》，中央編譯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等等。臺灣學者許育銘的《汪兆銘與國民政府——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對日問題下的政治變動》（臺灣「國史館」一九九九年版），研究了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年汪蔣合作、汪精衛主持國民政府行政院期間，對日妥協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及南京政府應對國難措施的演變。而汪晚年對日「求和」主張及汪偽政權研究，更是中國抗戰史研究中的重要方面，成果顯著。例如楊凡編譯：《抗日戰爭時期漢奸汪精衛賣國投敵資料》，出版者不詳，一九六四年；黃美真、張雲編：《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黃美真、張雲：《汪精衛集團叛國投敵記》，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現代史研究室編：《汪精衛漢奸政權的興亡——汪偽政權史研究論集》，復旦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王雲高：《汪精衛叛國前後》，中國華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萬仁元主編：《汪精衛與汪偽政府》，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陳鵬仁譯：《汪精衛降日秘檔》，臺北聯經出版

一九一〇年春，汪精衛在什刹海謀殺清攝政王被捕，四海揚名，成為革命者捨生求死的象徵。民國初年，享有崇高政治聲譽的他，功成身退，堅持「不做官吏」，赴法留學，以淡泊名利傳為美談。二十年代前期，孫中山倡導國民黨聯俄聯共，汪精衛隨即「左傾」，在孫逝世後，一舉登上國民黨的黨政軍最高領導地位。之後，汪以一文人政客，縱橫捭闔於軍人與地方實力派之間，時進時退，一度在國民黨中形成汪主政、蔣主軍的局面。

一九三八年三月，國民黨於抗戰中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賦予蔣介石總攬黨政軍權的總裁地位，汪居副總裁職。然而這一年底，汪就去國離職，公開議和，隨之被重慶中央開除國民黨籍。一九四〇年三月，主持「和談」的南京偽國民政府成立，汪精衛出任偽行政院長、代國府主席，從此成為「漢奸」的代名詞。遙想當年「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為人崇拜、仰慕，奉為革命偶像的時代。真可謂「雙照樓頭老去身，一生分作兩回人」。^三

如今汪精衛重拾舊照，回首前塵，恍若身在夢中……

事業公司，一九九九年；錢進，韓文寧：《偽府群奸：汪精衛幕府》，嶽麓書社二〇〇二年；等等。儘管如此，汪精衛研究仍留有很大的空間，有許多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

三 陳小翠：《題〈雙照樓詩詞稿〉》，轉引自葉嘉瑩：《汪精衛詩詞中的「精衛情結」》，《印刻文學生活》二〇〇九年三月。

第一章 死生：「烈士」成名

汪精衛在民國政治舞臺享有盛譽，很大程度上源於一九一〇年三四月間在北京什刹海對攝政王載灃的暗殺行動。這次暗殺雖未獲成功，但這種自殺式行動本身所表現出的自我犧牲精神，卻為汪精衛贏得了崇高榮譽，令聞之者壯懷激烈，感慕不已。

汪精衛被捕後，對自己的暗殺行動供認不諱，在獄中寫下洋洋灑灑痛斥清廷的千言「供詞」和十數首感懷雜詩，這些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為代表的詩作，飽含充沛的生命熱情，一經傳出，即廣為傳誦，為革命的流血犧牲塗上了一層絢麗的光彩，也使汪成了辛亥時代首屈一指的革命偶像。

一 關於汪早年暗殺清攝政王入獄的事件，在張裁江《汪精衛先生年譜》和各種汪精衛傳記中都有記述，張裁江的《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並楊雲史江亢虎序，《越風》雜誌一九三七年第三期，第四期）及張江裁的《汪精衛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珍本年譜叢刊》第一九九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據一九四三年鉛印本影印）對這一事件的前因後果更有詳細分析；王克文在《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臺灣「國史館」二〇〇一年版）一書中，對汪行暗殺所表現出的「烈士精神」進行了闡發。但是這些作品，對於辛亥時代所流行的激進敢死的時代風氣，對於以汪為代表的、辛亥時代「革命知識分子」的人格、心靈、行為特點，以及揭示養成這種心靈的社會文化環境，尚缺乏深入分析。缺乏這種分析和揭示，我們將難以理解，為什麼汪精衛依靠幾篇文章、幾首詩，和一次不成功的暗殺，就在民初積累了如此之高的社會聲望。

汪精衛的成名，反映出清朝末年漢人知識分子中流行的憂憤敢死的時代風氣。在那個時代裏，像他這樣，懷抱激烈排滿思想，推崇暗殺手段的青年知識分子，不勝枚舉，吳越因此稱之為「暗殺時代」。這是誕生汪精衛烈士精神與行動的歷史環境。

1.1 暗殺時代

荊軻墓，咸陽道；聶政死，屍骸暴。盡大江東去，餘情還繞。魂魄化成精衛鳥，血花濺作紅心草。看從今一擔好山河，英雄造。

——李叔同：《滿江紅》

譬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發達，我們之自由樹，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我今早死一日，我們之自由樹早得一日鮮血，早得血一日，則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故我現望速死也。

——安慶革命軍總司令熊成基被捕後的供詞

汪精衛原名汪兆銘，字季新，號精衛，一八八三年五月四日，生於廣東省三水縣的一個

沒落的仕宦家庭。其早年生活、成長的時代，恰逢清季衰末亂世，國家板蕩，社會紛亂，滿漢相仇，人心激越。一八九四年，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革命團體「興中會」，次年發動「乙未廣州起義」，犧牲慘劇，而革命排滿之風，由此開啟。一九〇三年，清廷先後製造「蘇報案」、「沈蕙案」。前者導致著名革命黨章太炎、鄒容被捕。後者更以野蠻杖斃手段，誅殺愛國書生，而使中外輿論譁然，全國士人熱血沸騰。反滿排滿之風從此愈益激昂。^二

一九〇四年，汪精衛赴日留學，次年夏天，在東京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也踏上了革命排滿之路。當時，革命黨人反清起義屢起屢敗，敵我力量對比懸殊，人心激憤，無可發洩，

二

沈蕙本為湖南一狂宕書生，戊戌期間與譚嗣同、唐才常等人交往，雖然反對政局，但仍傾向於「保皇派」。戊戌之後，沈蕙與唐才常一起組建自立軍，擔任右軍統領，參加了「庚子勤王」，被捕之後，竟在獄中被清廷「杖斃」。其死事之慘，令中外震驚。章士釗在《疏〈皇帝魂〉》之《第四十一篇：祭沈蕙文》中說：「蕙之死狀，記者非一，幾於言人人殊。」有記述說：「君之死也，備極五刑，先以八人輪毆，至二時許，血肉狼籍。氣瀕絕矣，以帛勒之，既死而復刃其頭，嗚呼，慘已。」王照有《方家園紀事詩》則稱：「沈入獄，時入夜半。宮中傳出片紙，天未明而沈已碎屍。……沈死之屋。粉牆有黑紫暈跡，高四五尺，沈血所濺也。獄卒為照言：夜半有官來，遵太上傳諭，就獄中杖斃，令獄吏以病死報。沈體壯，群杖交下，遍體傷折，久不死。連擊三小時，氣始絕。」及至汪精衛入獄時，獄卒告訴汪精衛，當沈蕙被捕時，西太后即欲殺之。當行刑官宣讀執行令時：「沈面色不改，但曰『快了事。』亂杖交下，骨折肉潰，流血滿地，氣猶未絕。於是裂其衣幅，塞口鼻及谷道，再杖，氣始斷。」上海《文匯報》認為，「沈蕙之死，震動人心，較之日俄開戰尤大」。章太炎認為，就激發革命而言，沈蕙之死的價值「遠駕譚嗣同、唐才常而上之」。楊守仁曾有《吊蕙詩》曰：「沈蕙血肉隨風靡，孕出多少革命鬼。大獄方興尚未已，偽臨朝武可危矣。」章士釗：《疏〈皇帝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集》，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十月第一版，第二九八—二九九頁。

暗殺之風日益興盛。自從湖北志士王漢刺殺鐵良未遂，憤然自殺之後，天下志士感慕而追隨，前赴後繼投身暗殺行動。早在汪精衛行刺攝政王之前，已有一九〇〇年史堅如暗殺兩廣總督德壽，一九〇四年楊毓麟、蘇鵬等橫濱暗殺團成員謀炸清廷宮苑，萬福華謀刺前廣西巡撫王之春，易本義謀炸戶部侍郎鐵良，一九〇五年九月吳樾謀炸出國五大臣，一九〇六年楊卓林謀刺兩江總督端方、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等一系列著名的暗殺事件。

一九〇五年孫中山組織同盟會於東京，革命勢力迅速發展，至第二年秋冬間，黨勢遍佈全國，留日學生亦紛紛回國，投身運動新軍的工作。一九〇七年，因廣東水師提督李準「日以捕黨人為邀功名」，被革命黨人視為大敵，汪精衛與馮自由、胡漢民等廣東革命黨人密謀，於廣東都督岑春煊，或水師提督李準，擇其一而炸之，必能在廣東政界軍界激起重大影響。議決之後，即由馮自由、李紀堂、汪精衛等設秘密機關於香港普慶坊，由劉思復慨然行之，暗殺李準，可惜沒有成功。一九〇九年夏和一九一〇年初，又發生了喻雲紀等謀炸兩江總督端方和二十三歲的安慶革命軍總司令熊成基謀刺籌辦海軍大臣載洵的事件。

一九一〇年三月，汪精衛、喻雲紀、黃復生、陳璧君等人組織暗殺團，謀炸清攝政王載灃。失敗後，汪被捕入獄，喻雲紀逃亡日本。次年春天，喻又到香港籌備廣州起義，並負責試製炸彈，在攻佔總督署的戰鬥中彈盡力竭被俘，英勇犧牲。

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失敗之後，甚至連一向反對暗殺的黃興，也因悲憤交

加，「欲躬行暗殺一二滿清重臣，以報死友」。^三後經孫中山、馮自由等人再三致電勸阻，才放棄親自從事暗殺的計劃，另派人組織暗殺團於廣州。

汪精衛對於暗殺，懷有一種真誠的信念，相信這種「直接激烈行動」，可以達到震盪人心，宣傳革命的效果。李劍農先生在《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中說：汪精衛自丁未（注：一九〇七年）以來，便懷一種「短兵突擊」的計劃，而屢為黃興、胡漢民等人所反對。宣統己酉元年（注：一九〇九年）的一年間，黃興、胡漢民秘密往來於南洋、香港間，致力於在廣州新軍中培養革命基礎，而汪精衛則「決意進行他的短兵突擊計劃」。

這一年中，汪、胡之間常通過書信往來進行辯論。胡漢民認為：此後，不但「暗殺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敵之死命的小規模軍事行動，「亦斷不可起」，因為，這種零星散碎的行動，成功幾率太小，一旦被鎮壓，反而增長了清廷的威望，使一般國民「愈生迷夢」。汪精衛則認為，清廷「偽立憲」的醜劇，「日演於舞臺，炫人觀聽」，愈演愈烈，而革命行動「寂然無聞」，如此，國人將越來越相信「立憲」，而不相信「革命」，必須有一種「直接激烈行動」，以振革命黨人聲勢。如果說，零星散碎的起義被鎮壓，足以傷革命黨人元氣，「至於暗殺，不過犧牲三數同志之性命，何傷元氣之有？」^四

三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新星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七七〇頁。

四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一八四〇—一九二六年》，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第二五七頁。

在清末風起雲湧的革命風潮中，走上暗殺之路的青年不知凡幾，他們有着共通思想和精神特質，信仰無政府主義哲學，崇拜荊軻、聶政，相互感發，相互激勵，不惜犧牲生命，「以殉名譽」。^五清末民初在中國流行的無政府主義，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其中最顯著者，莫過於它與清末激進革命運動的結合以及對「暗殺」手段的崇尚。

美國學者德里克曾指出：一九〇二—一九〇七年間，被無政府主義所吸引的中國年輕的激進派，是通過虛無黨的政治實踐，即通過個人的政治行動、特別是暗殺來認識無政府主義的。^六中國早期的無政府主義者，幾乎全部是從事革命運動的學生。他們崇拜無論壯少、無論男女「皆敢懷炸彈袖匕首，劫萬聖之尊於五步之內，以演出一段悲壯之歷史」的俄國虛無黨，相信當一國之國民皆陷於「晦盲否塞、沉酣不醒」之時，必須有人「挾猛烈之勢，行破壞之手段」，演出一段「掀天撼地之活劇」，否則國民意識難得蘇醒。^七

曾代理同盟會本部庶務幹事、一九〇六年在南京被捕的黨人孫毓筠，在供詞中說：「自吳樾死後，年少之士欽慕吳之大名，欲步後塵者日多一日，此種人較空談革命者更為激烈，愈殺愈多。俄國虛無黨之風，行將大盛於中國，此亦專制政體所養成者。憲政一日不實行，此事即一日不絕。」又說，其平日所挾之主義，「非有意與朝廷為難，只求以激烈手段，要求政府能

五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六集，第一〇九三頁。

六 德里克：《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第六七頁。

七 韓孫：《露西亞虛無黨》，《辛亥前十年時論選集》第一卷下冊，三聯書店一九六〇年版，第五六七頁。